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新变化与再考察

刘亚琳 申广军 姚 洋*

摘要 收入分配是极其重要的政策议题，劳动收入份额是初次分配的核心指标。本文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研究。我们首先整理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五个基本事实，特别指出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出现止降为升的新趋势。然后，我们主要从结构性因素、经济波动、技术进步偏向性、不完全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等五个方面，总结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特别是梳理了能够在统一的框架下解释金融危机前后劳动收入份额 U 形变化趋势的文献。最后我们展望了劳动收入份额的潜在研究方向。

关键词 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分配，U 形变化

DOI: 10.13821/j.cnki.ceq.2022.05.01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转变，说明新中国成立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能力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发展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其中，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领域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宏观上表现为社会生产关系中区域间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微观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差距。可见，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平衡增长和社会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收入分配制度列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显示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基础重要性和极端紧迫性。

* 刘亚琳，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申广军，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通信作者及地址：申广军，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510275；电话：(020) 84110672，E-mail: shengj6@mail.sysu.edu.cn。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573007)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CUFE20210033)的资助。感谢施新政的数据支持和蓝嘉俊、杭静对本文初稿的建议，也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收入分配格局的最终实现,需经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过程。初次分配是指国民收入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如劳动所有者因提供劳动服务而获得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及工资性收入和社会保险付款),土地所有者因出租土地而获得地租,资本所有者因提供不同形态的资本而获得利息、租金或红利等财产性收入。再分配是政府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现金或实物转移的方式,在各收入主体之间对生产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虽然再分配有助于收入分配的改善(李实等,2013;许志伟等,2013;蔡萌和岳希明,2018),但是初次分配作为再分配的基础,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Benjamin *et al.*, 2008; 李稻葵等, 2009)。

在参与初次分配的诸要素中,劳动和资本无疑是最重要的。以最近可得 的 2017 年资金流量表为例,初次分配总收入中劳动者报酬占 51.7%,资本所得占 35.2%,而地租和其他要素收入仅分别占 0.95%和 0.67%(其余为政府所得的生产税净额)。¹因此,研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应重点关注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其中,劳动收入份额是表征国民收入如何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分配的核心指标,其定义非常简单:

$$\text{劳动收入份额} = \frac{W}{Y} \times 100\% = \frac{wL}{Y} \times 100\%,$$

其中 W 为劳动者报酬总额,它等于人均工资 w 和劳动者数量 L 之积, Y 为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因此,劳动收入份额就是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例。

劳动收入份额指标很早就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有理论上的原因。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惯常使用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 $Y = AK^\alpha L^\beta$, 即资本投入 K 与劳动投入 L 共同生产 Y , 其中 α 和 β 为两种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分配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出,因此劳动者报酬为 $\beta AK^\alpha L^{\beta-1} \times L = \beta Y$, 即劳动收入份额等于常数 β 。著名的“卡尔多事实”强化了劳动收入份额不变的信念。卡尔多在一系列研究中讨论经济增长稳态的特征(Kaldor, 1955、1957),并最终将其总结为六条典型特征,即“卡尔多事实”,其中包括对收入分配的论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配份额大体上稳定不变(Kaldor, 1961)。西方发达经济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基本上遵循这一规律,比如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一直在 2/3 左右波动,西欧国家稍高,但也没有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Blanchard, 1997; Harrison, 2005)。这使得“卡尔多事实”成为建立宏观模型的基本要求,深刻地影响着关于生产函数、不平等、

¹ 资金流量表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分类,实际还存在一些细节问题。比如,通过劳动者的技术或者管理才能所获得的收入,可能被计入劳动者报酬;但如果劳动者以技术或者管理入股,带来的收入则计入财产性收入。

宏观经济动态等领域研究 (Giovannoni, 2014), 而劳动收入份额似乎也成为无关紧要的问题。

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西欧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降; 最晚到 90 年代初期, 美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开始下降 (Harrison, 2005; 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3)。因此, 2000 年以来劳动收入份额成为国外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国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随之跟进, 因为研究者发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也在不断下降。并且由于两方面的原因, 这一问题对我国更为重要。一方面, 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比很低, 对劳动收入的依赖更加严重。比如, 宁光杰等 (2016) 发现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仅占可支配收入的 3.1%, 而西方国家的这一比例可以达到 20% 以上。另一方面, 跨国比较显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较低 (李稻葵等, 2009; 罗长远和张军, 2009a), 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但直到白重恩等 (2008)、白重恩和钱震杰 (2009)、罗长远和张军 (2009a、2009b)、李稻葵等 (2009) 等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发表, 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研究主题才真正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已有文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 比如罗长远 (2008) 回顾了国外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进展, 周明海等 (2010b) 对国内早期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评述。但出于三方面的原因, 有必要再次对现有研究进行总结、评述, 并展望潜在的研究方向。首先, 上述综述性文章发表以来, 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又持续了十年左右, 发表数量激增, 并取得了许多新进展。其次,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原有的下降趋势得以逆转, 这种新变化不仅能从反面检验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解释, 而且呼唤新的研究持续跟进。最后, 更为重要的是, 劳动收入份额问题越来越引起公众和决策者的重视。比如,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会议决定提出, 要“着重保护劳动所得, 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20 年 4 月 9 日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再次重申了“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凸显出国家对收入分配, 尤其对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问题的重视。

本文按以下思路展开。首先总结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趋势和特征事实, 特别指出金融危机之后转降为升的新趋势; 然后梳理文献中探究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因素, 主要将金融危机前后劳动收入份额 U 形变化放在统一框架下进行解释; 最后, 总结全文并展望研究前景和方向。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基本事实

虽然各文献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测算的绝对值有差异, 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本部分从五个维度总结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特征事实,

特别关注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基本事实一 在金融危机前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总体处于下降趋势。

卡尔多事实指出,要素份额在长期基本保持不变,这也与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实际情况吻合。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突然发现,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下降(皮凯蒂,2014)。而且,这一现象也相继在发展中国家出现(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3)。在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下降也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李稻葵等,2009;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3)测算了自1975年以来全球59个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每10年)平均增长率,发现包括中国、美国、日本等在内的46个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处于下降趋势,8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只有英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小幅上涨。由此可见,劳动收入份额在金融危机之前的下降趋势不仅存在于我国,其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基本事实二 跨国比较显示,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文献中的结果集中在0.4—0.6之间;而Gollin (2002)测算的世界平均劳动收入份额的范围在0.6—0.7之间,即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吕光明(2011)利用三种Gollin修正法对多国数据进行测算的结果也显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低约10个百分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低约5个百分点。这与陈宇峰等(2013)利用跨国数据进行横向比较时发现的结论一致,即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U形关系。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3)对1975—2012年公司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测算,发现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在0.6—0.65左右;而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0.35—0.45之间波动。陆雪琴和田磊(2020)使用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进行国际比较,确认在不涉及混合收入的非金融企业部门中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是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虽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上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但不同部门存在差异。比如,肖红叶和郝枫(2009)发现我国非农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低于美国,而农业部门没有显著差异。钱震杰和朱晓冬(2013)进一步比较了工业统计数据库的样本国家,利用跨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分析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我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系统地低于其他国家。

基本事实三 我国各产业中,农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最高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工业劳动收入份额已处于倒U形变化的下降阶段,而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超过工业且逐年上升。

在我国的三次产业中,农业因其劳动密集的特征而有最高的劳动收入份额,建筑业其次,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最低。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

认为，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之所以如此高，是因为在对农业收入进行核算时把难以区分的劳动报酬与营业盈余均划归为劳动者报酬。他们使用产出弹性估计值调整农业要素收入份额，发现调整后的农业劳动收入份额大大降低，大致取值范围在0.4—0.7。而对于工业劳动收入份额，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发现其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影响较大。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近年来服务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不断提高，呈现出与其他产业相反的变化趋势。而且随着经济结构转型，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提高，服务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趋势将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更大的影响（刘亚琳等，2018）。

基本事实四 省级统计显示，东部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低于西部省份，但该差异在逐年收敛。

周明海（2014）对1978—2007年我国各省的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测算，30个省份（直辖市）中只有北京、上海和辽宁的名义劳动收入份额呈现上升趋势；在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后，除了北京市，其他省份（直辖市）的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均在不断下降。罗长远和张军（2009a）发现我国东部地区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低于中西部地区，但在1993—2004年，这种地区间差异正在逐步收敛。他们认为，东西部劳动收入份额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各地区产业内部生产的资本劳动比等特点有关。Chi and Qian（2013）同样也发现沿海省份虽然劳动报酬比较高，但是其劳动收入份额相对内陆的却比较低；此外，2003年之后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来自我国西部地区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

基本事实五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得以逆转，并出现上升的新变化。

尽管文献中测算的具体数值存在差异，但无论是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还是我国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在2007年达到最低点之后开始上升的基本趋势保持一致（图1）。比如，利用宏观数据的测算，刘亚琳等（2018）计算的GDP法劳动收入份额从1998年的0.52下降到2007年的0.47，之后开始在波动中回升，到2014年恢复到0.51左右；蓝嘉俊等（2019）也印证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是以金融危机时期为转折点呈现出回升趋势。²在微观统计方面，施新政等（2019）使用上市公司数据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发现，虽然上市公司并不是经济部门中有代表性的企业，但其劳动收入份额也呈现出在2007年触底、而后开始提高的趋势，与宏观数据给出的信息一致。此外，陆雪琴和田磊（2020）使用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加权的结果显示，在

² 更准确地，金融危机之后至2010年左右，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急剧上升；经过2010年的短暂下降，之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较为平缓的上升趋势。

1998—2007年间我国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是不断降低的；同时，他们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印证了企业加权劳动收入份额在2007年之后确实有明显上升。虽然仍需更长的时间跨度、更丰富详尽的数据来描述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但目前其上升趋势这一新变化基本得以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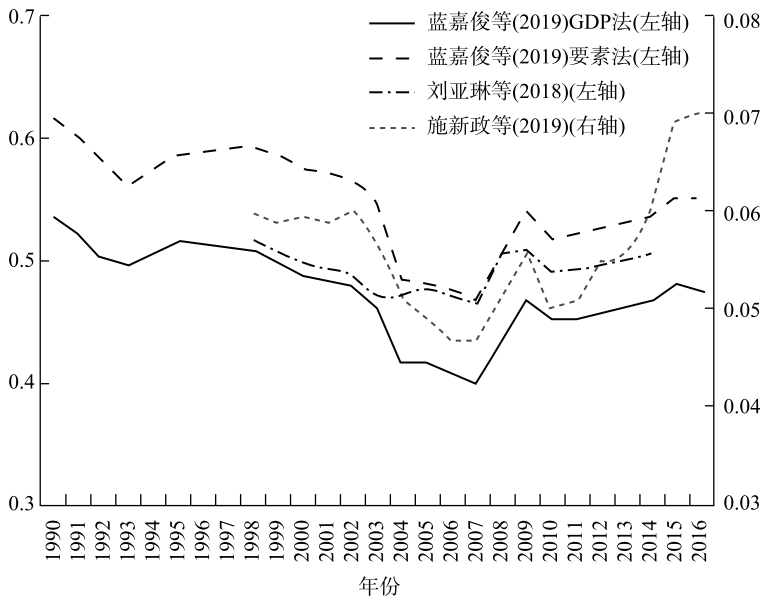


图 1³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趋势比较

注：数据分别来自刘亚琳等（2018）、施新政等（2019）和蓝嘉俊等（2019）。

三、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再解释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劳动收入份额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下降趋势，说明有着共同的力量驱使，比如技术进步、全球化等。已有文献主要针对国内外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进行解释，研究集中在以下四种一般性影响因素的讨论：结构性因素、有偏技术进步、不完全竞争和商品与资本全球化。此外，还有针对中国的制度性因素也只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施新政等，2019；盛丹和陆毅，2017；周明海等，2010a；万江滔和魏下海，2020）。但对于金融危机之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研究，并不能直接用来解释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趋势。

探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 2008 年前后开始上升的原因，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视角展开。一方面，开始关注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U 形变动趋势的解释：

³ 如需基本事实一至基本事实四对应的图示，请联系作者索取。

一支文献研究经济发展规律中的结构变化，包括城乡二元结构和产业结构；另一支文献则尝试从经济波动规律中寻找原因。另一方面，开始研究能够扭转之前下降趋势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影响因素：重新考虑有偏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等，检验其在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变化是否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现象也具有解释力。

（一）结构性因素：劳动收入份额的 U 形趋势

按照 Solow (1958) 的方法，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可以分解为产业间与产业内的变动：

$$\Delta \frac{w}{v} = \Delta \left[\sum_i \frac{w_i}{v_i} \times \frac{v_i}{v} \right] = \sum_i \frac{w_i}{v_i} \times \left(\Delta \frac{v_i}{v} \right) + \sum_i (\Delta \frac{w_i}{v_i}) \times \frac{v_i}{v}, \quad (1)$$

其中， i 代表不同产业， $w = \sum_i w_i$ 是总的劳动报酬， $v = \sum_i v_i$ 是总增加值。

$\Delta \frac{v_i}{v} = \frac{v_i'}{v'} - \frac{v_i}{v}$ 是各产业增加值在总增加值中占比的变动，用来衡量产业结构

变化； $\Delta \frac{w_i}{v_i} = \frac{w_i'}{v_i'} - \frac{w_i}{v_i}$ 是各产业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用来衡量产业内变化。

国内早期研究更强调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a）的产业分解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产业间效应，解释力高达 64%。进一步地，李稻葵等（2009）在二元经济理论框架下，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将呈现 U 形变化趋势。这是因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不断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直到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相等。劳动力流转初期，由于工业劳动边际产出远高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经济总产出的迅速增长，但由于农业有大量（过剩的）劳动供给，所以工资率保持稳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但在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减少而生产率快速增长，工业部门由于劳动流入而生产率下降（但仍高于农业部门），此时总产出增长缓慢而工资率迅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转而上升。通过上述分析，李稻葵等（2009）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呈现 U 形趋势是经济发展中的一般规律，并使用跨国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进行了检验。跨国数据分析显示，劳动收入份额将于人均 GDP 6 000 美元（按 2000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时达到最低点，并且我国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也符合这一基本规律。这一分析不仅解释了金融危机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而且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左右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会进入上升通道”（李稻葵等，2009，第 81 页）。

李稻葵等(2009)强调了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过程中,由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引起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其他影响,比如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结构效应是指农村劳动力从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工业部门,会直接影响经济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⁴;竞争效应是指农村劳动力转移会改变工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谈判能力,从而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翁杰,2011)。虽然李稻葵等(2009)的理论分析过于精简,实证研究考察的是一种统计关系而非因果效应,但这一研究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的预测与现实非常一致,有助于我们理解金融危机以后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的原因。

经济发展过程中更普遍的产业结构变动规律是农业比重不断减少、服务业比重不断增长、工业比重先增后减,因此更好地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变动趋势,需要嵌入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规律。刘亚琳等(2018)在Mao and Yao(2012)建立的三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分析了结构转型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规律。具体机制如下所述。劳动收入份额以农业部门最高,工业部门最低,服务业居中,而经济整体的劳动收入份额是三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值,权重为各部门增加值。由于各部门就业比重与短期价格无关,且与增加值高度相关,所以可以近似地考察就业比重而非增加值比重:农业和服务业就业比重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高;而工业就业比重越高,劳动收入份额就越低。所以,产业结构变化中工业比重的倒U形变化规律就决定了劳动收入份额会呈现U形演变趋势。作者使用我国省级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分析。⁵

但应注意,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趋势与工业就业比重的倒U形趋势在时间上并非精确对应。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工业就业比重下降会提高整体劳动收入份额,农业就业比重下降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只有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的影响时,整体劳动收入份额才会转降为升,这要求工业就业比重的下降速度足够快。所以,一般而言工业就业比重的转折点要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转折点。刘亚琳等(2018)使用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估计和预测,发现工业比重的倒U形转折点将出现在2020年前后,而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转折点出现于2030年左右。就目前可得数据来看,劳动收入份额转降为升的实际时间早于他们的预测。作者将其解释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危机主

⁴ 常进雄等(2019)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认为劳动力转移初期存在结构效应,并且由于剩余劳动力丰富,企业支付给转移劳动力的工资低于其边际产出,导致非农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随着劳动力转移的持续进行,转移劳动力工资越来越接近其边际产出,非农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上升。

⁵ 陈宗胜和宗振利(2014)也使用省级面板数据证实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存在U形趋势,但他们仍然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的研究,而刘亚琳等(2018)强调的是三次产业结构的影响。

要影响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劳动收入份额最高的第一产业重新获得了相对优势，使得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转折点提前出现。

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结构性因素除了长期的产业结构变动，现有文献也开始从社会人口结构（性别比例）、收入结构（收入不平等）等可变因素的角度进行研究（Giovannoni, 2014）。但这些研究，无论是认为地区性别失衡导致本地竞争性储蓄增加进而增加企业资本集约度，从而显著降低所在地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魏下海等，2017），还是认为社会收入分化和社会财富集中于更高收入人群导致的资本收入增加而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Autor *et al.*, 2013; Giovannoni, 2014），目前都无法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现象。

（二）经济波动：劳动收入份额的周期性

Goodwin (1967) 较早地注意到经济波动中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的周期性问题。与经典的卡尔多模型不同，Goodwin 模型不再是充分就业状态，而允许存在失业现象，由此引发劳资双方的策略性斗争并决定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国外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呈现逆周期。比如，Gomme and Greenwood (1995) 报告美国剔除趋势的劳动收入份额和 GNP 的相关系数为 -0.37 或 -0.22 （取决于 GNP 中是否剔除经营性收入）；Boldrin and Horvath (1995) 报告劳动收入份额和 GNP 的相关系数为 -0.32 。这两份研究通过引入劳动契约或保险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因为劳动契约和保险的功能都是在经济衰退期和经济扩张期之间平滑劳动者收入。Young (2004) 发现 HP 滤波之后的 GDP 和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系数为 -0.29 （以 GDP 为分母计算劳动收入份额）或 -0.42 （以国民收入为分母计算劳动收入份额）。受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理论影响，Young (2004) 将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归因于有偏技术进步。吉润东等 (2019) 按照 Young (2004) 的方法计算了 OECD 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和 GDP 的相关系数，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普遍存在，相关系数均值为 -0.36 ，只有少数国家表现出微弱的顺周期特征。

经历了 30 多年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GDP 增长率由 2011 年的 9.5% 下降到 2014 年的 7.3% ，2015 年以来更是维持在 7% 以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如果劳动收入份额是逆周期的，那么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速减缓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国内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周期性的研究较少，但大多数研究仍支持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比如，常进雄和王丹枫 (2011) 使用上市公司数据、唐东波和王洁华 (2011) 使用行业面板数据、马草原和王美花 (2015) 使用省级面板数据，都验证了

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一个例外是谢攀和李静(2010),他们使用1994—2007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劳动报酬的周期性反应函数,发现劳动收入份额是弱顺周期的,且繁荣和衰退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他们从经济周期与“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一发现。马草原和王美花(2015)认为顺周期性是由于谢攀和李静(2010)使用HP滤波的波动项作为经济周期的代理变量;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其仅使用产出缺口来设定“繁荣”和“衰退”的虚拟变量,从而损失了相当多的时间序列信息。吉润东等(2019)同样使用HP滤波的波动项来衡量经济波动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整体上呈现逆周期性,1992—2016年GDP和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系数为-0.31。

上述几份研究也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逆周期性的原因。唐东波和王洁华(2011)指出,如果工资对劳动需求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有足够的弹性,劳动收入份额会出现顺周期特征,但实际经济运行中工资调整存在各种摩擦,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正是源于工资不能及时反映劳动需求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马草原和王美花(2015)也从工资黏性角度解释了他们的逆周期发现,进而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变化规律。吉润东等(2019)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工资存在黏性。他们指出,我国劳动力市场有两类劳动力: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包括大部分农民工,其签订劳动协议的比例很低。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的数据,仅有40%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而合同期在一年及以上的比例甚至不到20%。当经济下行时,企业能够以极低的成本甚至无成本地解雇这些工人。因此,这部分工人的报酬份额不会存在周期性特征,逆周期完全来自高技能劳动力的报酬份额,因为高技能工人往往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并且通常是长期劳动合同。经济形势变动时,劳动合同阻碍工资和就业的充分调整,从而主导了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

上述解释劳动收入份额逆周期的研究,本质上都依赖于工资不能迅速调整这一假设,但工资黏性的实际解释能力有多强仍有待进一步论证。即使抛弃这一假设,仍可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贾坤和申广军(2016)扩展了Holmström and Milgrom(1987)的经典模型,考察了面临经营风险时劳动者和企业家的行为变化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他们发现,当企业面临的风险降低时,劳资双方最优的收入风险分担结构将赋予劳动者更高的产出分成比例,这会增强对劳动者的生产激励,于是产出和工资都得以增长。但是,在劳资双方讨价还价能力给定的情况下,其结果是劳动者的工资总额有

⁶ 一个差别是他们按照Young(2004)的做法对波动项进行了标准化,实际使用的是波动项相对于趋势项的偏离。

所增加，但总产出因劳动者努力程度提高而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从而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作者使用了“企业风险”这样的术语，但他们实证研究中使用企业亏损率衡量企业风险，实际上表征的正是经济形势变化。根据这一思路，金融危机以来经济疲软，不断攀升的企业亏损率将同时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三）有偏技术进步

根据前面 Solow (1958) 的分解公式 (1)，除了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规律的影响，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还会源于产业内部效应。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超过 90% 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发生在产业内部 (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4; IMF, 2017)。胡秋阳 (2016) 针对国内的研究也强调了产业内部效应的重要性：基于最终需求结构、价值链结构和产业内部效应的三因素模型得到的定量结果表明，产业内部效应对 1997—2007 年我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贡献度高达 70.2%，而产业结构效应仅为 29.8%。他认为，早期研究使用的收入法国内生产总值发生过重大的统计方法变动，据其计算可能高估产业结构效应的贡献，而他使用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在统计方法上有较好的一致性，因此结论更加可靠。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产业内部效应中，有偏技术进步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下面以常替代弹性 (CES) 生产函数为例进行说明：

$$Y = A [\theta K^{\frac{\sigma-1}{\sigma}} + (1-\theta)(A_L L)^{\frac{\sigma-1}{\sigma}}]^{\frac{\sigma}{\sigma-1}}, \quad (2)$$

其中， Y 为总产出， L 和 K 分别为劳动力和资本投入， A 和 A_L 分别对应全要素生产率（希克斯中性）和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 θ 表示资本与劳动的相对占比， σ 则为要素替代弹性。当 $\sigma < 1$ 时，资本与劳动为互补关系；当 $\sigma > 1$ 时，资本与劳动为替代关系。那么，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最大化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 ($\frac{wL}{PY}$) 等于劳动的产出弹性 ($\frac{\partial \ln Y}{\partial \ln L}$)，并结合公式 (2) 得到：

$$\frac{wL}{PY} = \frac{\partial \ln Y}{\partial \ln L} = \frac{1}{1 + \left[\frac{\theta}{1-\theta} \left(\frac{K}{A_L L} \right)^{\frac{\sigma-1}{\sigma}} \right]}. \quad (3)$$

公式 (3) 表明，当资本和劳动为互补时 ($\sigma < 1$)，采用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会更大比例地增加资本的边际产出（即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若技术进步为资本增强型（或劳动偏向型），则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因此，通过理论分析可以确定的是有偏技术进步会通过非对称地改变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产业内的要素收入分配，但具体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实证研究也发现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可能产生两方

面影响：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面影响；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则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Stockhammer, 2013）。此外，郭凯明（2019）以人工智能为例，建立一个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情形进行模拟后指出，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主要取决于不同行业间的人工智能产出弹性和人工智能与传统生产方式的替代弹性。

检验技术进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关键在于如何测算技术进步的偏向性。早期的研究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中无法用其他因素解释的部分归因于技术进步（黄先海和徐圣，2009）；最新的研究则借助生产函数，更加准确地估计有偏技术进步（陈宇峰等，2013；Zhang, 2019）。这些研究均发现我国的技术进步为资本偏向型（或劳动节约型），并且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王林辉和袁礼（2018）的研究指出，我国有偏技术进步的作用表现出阶段性特征与产业差异：1996—2002年第二产业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解释力为35.18%；2003—2012年第三产业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解释了48.26%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以上研究表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由下降转为上升的原因可能在于，有偏技术进步从原来的资本偏向型转为更加劳动偏向型，但这一点仍需更深入的研究。

此外，王林辉和袁礼（2018）的研究还表明，有偏技术进步同时具有产业效应和结构效应。一方面，技术进步会非对称地影响要素边际产出，从而对产业内的要素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会诱导生产要素进行跨部门流动和资源重新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变迁。他们的实证结果显示，除1996—2002年以外，我国有偏技术进步主要通过直接的产业内效应而非结构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然而，周茂等（2018）的研究则强调了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他们围绕技术进步构建衡量城市产业升级的新指标，准确地评估了我国地区产业升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业升级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更多的是结构性变化，即拉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工资、从业人数比重以及劳动收入。

（四）不完全竞争

新古典理论假设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但我国在经济发展前期偏离充分市场经济体制与完全竞争市场，要素市场存在大量摩擦。所以，最新的文献在分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时会更多地考虑不完全竞争的因素。例如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状况，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王宋涛等（2017）的理论模型发现，要素市场的分割会造成地区间的资本密集度差距扩大，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同

时，他们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要素市场越不统一，特别是在制度环境越差的地方，劳动收入份额也越低。

具体到劳动力市场，翁杰和张锐（2017）关于户籍制度的讨论认为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户籍制度会使得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因户籍歧视而较低，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转移效应）；另一方面，由于户籍制度的放松减小了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意味着对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歧视程度降低，能够减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工资效应）。所以，在户籍管理制度较为宽松的前期，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效应大于工资效应，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出现了下降；但当进一步放松户籍制度后（大致在2005—2007年），劳动力转移的弹性降低，从而使户籍制度的工资效应大于转移效应，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出现上升。随着我国城镇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但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涌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多集中于个体私营经济部门，从而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分割（蓝嘉俊等，2019）。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背景下，蓝嘉俊等（2019）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他们发现，随着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个体私营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将呈现U形变化，其中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约30%可以由城镇私企就业比重提高来解释。而这一结论成立的重要前提是，农业劳动力比重存在一个临界点，当跨越该临界点时，个体私营部门就业比重的提高会使得劳动收入份额由下降转为上升。

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也能够通过影响资本-劳动比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柏培文和杨志才（2019）运用模型构建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主要由经济发展速度（经济波动）、第三产业比重（经济结构）和劳动力议价能力三个因素拉动，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其中劳动力议价能力的解释力最强（贡献了11.88%）。董丰等（2020）也指出劳动力议价能力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中的作用。他们没有具体分析劳动力议价能力的影响幅度，但指出近年来我国去杠杆的过程中，企业负债率的下降会降低资方议价能力，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有积极作用。陆雪琴和田磊（2020）则尝试从企业规模分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角度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U形变化。他们认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2010年之前的下降主要是由企业规模分化引致，因为规模大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更小，这与Autor *et al.*（2020）对于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解释一致；而2010年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则是源于我国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成本上升，企业内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因此，劳动力议价能力提高以及我国劳动力

成本上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的上升趋势。

此外,文献对于资本市场摩擦与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讨论目前仅集中在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尚未涉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一方面,资本市场摩擦的讨论主要针对融资约束。罗长远和陈琳(2012)基于文献提出并验证了如下假说: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通过信贷获得流动资金的能力下降,所以倾向于减少劳动雇佣或降低工资,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与我国资本市场摩擦相关联,文雁兵和陆雪琴(2018)发现,由于金融机构对不同所有制或不同行业的企业存在差别对待,部分企业的融资成本更高,同样是因为工资成本变高而导致其劳动收入份额会相应更低。另一方面,讨论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主要是指企业的垄断能力。白重恩等(2008)引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和企业目标函数的差异,建立了要素分配份额的决定模型,并通过系统GMM方法验证了垄断能力越高,则资本收入份额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低)。申广军等(2018b)则使用198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企业层面验证了垄断力量和劳动收入份额的负相关关系。他们发现,增强的市场力量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10%;对于连续存在的企业,解释力度则高达30%。最近,Brooks *et al.* (2021)使用中国和印度的数据,也同样发现垄断力量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五) 经济全球化

除了以上影响因素,开放经济中的全球化影响也被广泛讨论。现有研究更多地基于生产的全球化以及我国特殊的加工贸易形式来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蒋为和黄玫立(2014)从国际生产分割的角度建立模型并分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即当一国的资本密集度水平较低时,一国的劳动越充裕,在参与国际生产分割后的劳动相对价格下降得就越快。张杰等(2012)强调我国出口的特殊性,即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我国本土企业更多从事加工贸易生产,受到发达国家订单发包企业的“纵向压榨”和“俘获效应”,从而面临着出口产品的价格无法随成本上涨而提高的困境。而在我国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贸易条件(出口价格/进口价格)恶化所带来的影响将会更多地转嫁给我国劳动者,最终出现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资本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那么,按照目前文献的分析逻辑,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下降、生产要素密集度的转变、加工贸易份额的减少,生产的全球化将会有助于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资本的全球化也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当资本的流动性增强时,资本对外部更高回报率追逐使得劳动力相对于资本所有者的谈判能力在下

降，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Rodrik，1997；唐东波，2011）。邵敏和黄玖立（2010）、戴小勇和成力为（2014）的研究分别从“工资溢出”和“技术效应”的角度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前者产生的可能原因是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从而吸引高技能劳动力向外资企业流动，导致内资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后者主要指外资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由此产生的超额收益更多地被利润侵蚀，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除少数文献之外，如唐东波和王洁华（2011）探讨了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目前国内学者多集中于讨论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且，基于资本全球化或资本流动视角的研究，目前只解释了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并未涉及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国民收入如何在生产要素之间分配，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关系着经济平衡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现实问题。本文回顾了近年来我国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我们首先整理了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几个事实：纵向来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在金融危机之前总体处于下降趋势，而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上升的迹象；横向比较，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分产业来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分别呈现下降、倒U形变化以及逐年上升趋势；分地区来看，东部省份的劳动收入份额普遍低于西部省份。然后，我们从结构变化、经济波动、技术进步的偏向性、不完全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等角度，讨论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几类影响因素，特别是那些可以同时解释金融危机之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金融危机之后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原因。

现有研究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现状和成因，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有一些细分领域需要更多的探索。

第一，金融危机以来的新变化值得更深入的研究，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现有研究从微观和宏观层面都对金融危机之前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细致的测算，但对金融危机之后的测算仍十分粗糙，尤其缺乏基于大样本微观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另一方面，正如第三部分所看到的，研究金融危机之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文献很多，但只有少数文献指出的因素可以同时解释金融危机之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对此我们仍需要更广泛的研究，并将其与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第二，在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文献中，大部分使用简约式（reduced-form）回归，研究某些特定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两个方面

仍有所欠缺。一方面,现有研究忽略了考察各类因素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社会环境。比如,资本深化或有偏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取决于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郭凯明,2019),而我国现阶段生产过程中要素替代弹性所处的范围,文献里仍未有可靠的判断。比较申广军等(2018a)和 Li *et al.* (2021),前者发现增值税减税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而后者则认为企业所得税减税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除了税种差异,二者的重要区别可能在于申广军等(2018a)研究的工业企业与 Li *et al.* (2021)研究的服务业有着不同的要素替代弹性。另一方面,现有研究缺少一般均衡的研究框架,无法厘清并准确测度各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真实影响效应。例如,绝大多数文献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影响因素⁷,但 Acemoglu (2002)指出国际贸易会导致技术进步偏向技能劳动力。因此,技术进步与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并不能完全区分:全球化得益于技术进步,而又有助于技术进步的扩散(IMF, 2017)。

第三,研究劳动收入份额除了针对指标测算、基本事实和成因解释,当前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劳动收入份额造成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影响。(1)劳动收入份额如何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最终格局。劳动收入份额属于功能性分配的范畴,而居民收入分配属于规模性分配的范畴,经济学家虽然重视收入分配的研究,但对两类分配的研究各行其道,很少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Atkinson, 2009; 周明海等, 2012)。表面上看,二者存在相当直接的联系:功能性分配是规模性分配的基础和起点,前者经过社会转移支付的再分配过程,即可形成最终分配格局。但实际情况更加复杂。由于各类要素收入都流入家户部门,所以要素收入份额对最终分配格局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要素在家户之间的分布(郭庆旺和吕冰洋, 2012)。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如果资本和劳动在家户之间平均分配,那么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不会对最终分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要素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实证问题。国外的研究显示劳动收入份额与基尼系数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Daudey and García-Peñalosa, 2007; Checchi and García-Peñalosa, 2008)。周明海和姚先国(2012)考察了1978—2006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和基尼系数的变动模式,发现二者呈反向变动关系,相关系数高达-0.83。这是因为,居民收入中劳动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资本收入不平等程度,要素收入分配向劳动倾斜将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郭庆旺和吕冰洋, 2012)。但上述研究主要是描述分析,要确认二者的关系,仍需严格的实证检验。

⁷ 少数文献,如张莉等(2012)提出并检验了国际贸易影响技术进步偏向,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2) 劳动收入份额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无论是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 都会涉及劳动收入份额。一方面, 传统的供给学派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认为经济增长会以牺牲劳动收入份额为代价。而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 例如罗默的知识积累模型和强调人力资本的卢卡斯模型, 如果劳动收入份额对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 那么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此外, 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表达式看, 劳动收入份额可以看作是实际工资增长与平均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 ($\frac{w}{P} / \frac{y}{L}$)。因此, 当维持实际工资增长率相对稳定时,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即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IMF, 2017)。另一方面, 需求学派的理论则更加重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国内需求来看, 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小直接影响居民消费倾向, 进而可以影响经济增长。但劳动收入比重与总需求的相关关系, 则取决于一国需求体系为工资领导型还是利润领导型 (黄乾和魏下海, 2010)。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 黄乾和魏下海 (2010) 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可以促进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 (工资领导型)。此外, 周明海等 (2010c) 的理论分析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与经济非均衡增长密切相关, 而经济增长的非均衡特征在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发挥了作用。总之, 研究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增长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具有重要意义, 但目前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 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探讨明显不足, 也值得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 考 文 献

- [1] Acemoglu, D.,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2, 69 (4), 781-809.
- [2] Atkinson, A. B., “Factor Shares: The Principal Problem of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9, 25 (1), 3-16.
- [3] Autor, H., D. Dorn, and G. H. Hanson, “The Geography of Trade and Technology Shoc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3), 220-225.
- [4] Autor, D., D. Dorn, L. Katz, C. Patterson, and J. Van Reenen, “The Fall of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Rise of Superstar Firm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0, 135 (2), 645-709.
- [5] 白重恩、钱震杰, “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 《经济研究》, 2009年第3期, 第27—41页。
- [6] 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 “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 《经济研究》, 2008年第8期, 第16—28页。
- [7] 柏培文、杨志才,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管理世界》,

- 2019年第5期,第78—91页。
- [8] Benjamin, D., L. Brandt, J. Giles, and S. Wang, "Income Inequali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In: Brandt, L. and T. Rawski (eds.), *China's Grea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729-775.
- [9] Blanchard, O., "The Medium Term",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7, 2, 89-158.
- [10] Boldrin, M., and M. Horvath, "Labor Contracts and Business Cycl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03 (5), 972-1004.
- [11] Brooks, W., J. Kaboski, Y. Li, and W. Qian, "Exploitation of Labor? Classical Monopsony Power and Labor's Sha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1, 150, 102627.
- [12] 蔡萌、岳希明, "中国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年第1期,第36—44页。
- [13] 常进雄、王丹枫, "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变化趋势与要素贡献", 《统计研究》, 2011年第5期,第58—64页。
- [14] 常进雄、朱帆、董非, "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投资率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世界经济》, 2019年第7期,第24—45页。
- [15] Checchi, D., and C. García-Peñalosa,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 Policy*, 2008, 23 (56), 602-649.
- [16] 陈宇峰、贵斌威、陈启清, "技术偏向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再考察", 《经济研究》, 2013年第6期,第113—126页。
- [17] 陈宗胜、宗振利, "二元经济条件下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经研究》, 2014年第2期,第41—53页。
- [18] Chi, W., and X. Qian, "Regional Disparity of Labor's Share in China: Evidence and Explan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3, 27, 277-293.
- [19] 戴小勇、成力为, "出口与FDI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影响", 《世界经济研究》, 2014年第8期,第74—80页。
- [20] Daudey, E., and C. García-Peñalosa, "The Personal and the Factor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7, 43 (5), 812-829.
- [21] 董丰、申广军、焦阳, "去杠杆的分配效应——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 《经济学》(季刊), 2020年第19卷第2期,第451—472页。
- [22] Giovannoni, O.,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Labor Share and the Profit Shar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803, 2014.
- [23] Gollin, D., "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2, 110 (2), 458-474.
- [24] Gomme, P., and J. Greenwood, "On the Cyclical Allocation of Risk",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95, 19 (1-2), 91-124.
- [25] Goodwin, R., "A Growth Cycle", In: Feinstein, C. H. (ed.),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54-58.
- [26] 郭凯明, "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管理世界》, 2019年第7期,第60—77页。
- [27] 郭庆旺、吕冰洋, "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经济研究》, 2011年第6期,第16—30页。
- [28] 郭庆旺、吕冰洋, "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12期,

第 46—62 页。

- [29] Harrison, A., "Has Globalization Eroded Labor's Share? 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 *MPRA Paper*, No. 39649, 2005.
- [30] Holmstrom, B., and P. Milgrom, "Aggregation and Linearity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temporal Incentives",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87, 55 (2), 303-328.
- [31] 胡秋阳, "产业分工与劳动报酬份额", 《经济研究》, 2016 年第 2 期, 第 82—96 页。
- [32] 黄乾、魏下海, "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贸经济》, 2010 年第 4 期, 第 121—127 页。
- [33] 黄先海、徐圣, "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 《经济研究》, 2009 年第 7 期, 第 34—44 页。
- [34] IMF, "Understanding the Downward Trend in Labor Income Shares", i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aining Momentum?* Washington, 2017.
- [35] 吉润东、茅锐、申广军、姚洋, "劳动力结构、调整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的逆周期性", 北京大学工作论文, 2019 年。
- [36] 贾坤、申广军, "企业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 《经济研究》, 2016 年第 5 期, 第 116—129 页。
- [37] 蒋为、黄玖立, "国际生产分割、要素禀赋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 《世界经济》, 2014 年第 5 期, 第 28—50 页。
- [38] Kaldor, N.,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5, 23 (2), 83-100.
- [39] Kaldor, N., "A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1957, 67 (268), 591-624.
- [40] Kaldor, 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utz, A. and D. Hague (eds.), *The Theory of Capital*. London: Springer, 1961, 177-222.
- [41] Karabarbounis, L., and B. Neiman,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 129 (1), 61-103.
- [42] Karabarbounis, L., and B. Neiman, "Capital Depreciation and Labor Shares around the World: Measurement and Implic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606, 2014.
- [43] 蓝嘉俊、方颖、马天平, "就业结构、刘易斯转折点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与经验研究", 《世界经济》, 2019 年第 6 期, 第 94—118 页。
- [44] Li, B., C. Liu, and S. Sun, "Do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Decrease Labor Shar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1, 150, 102624.
- [45]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 "GDP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U 型规律", 《经济研究》, 2009 年第 1 期, 第 70—82 页。
- [46] 李实、赖德胜、罗楚亮,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 [47] 刘亚琳、茅锐、姚洋, "结构转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经济学》(季刊), 2018 年第 17 卷第 2 期, 第 609—632 页。
- [48] 陆雪琴、田磊, "企业规模分化与劳动收入份额", 《世界经济》, 2020 年第 9 期, 第 27—48 页。
- [49] 罗长远, "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 《世界经济》, 2008 年第 11 期, 第 86—96 页。
- [50] 罗长远、陈琳, "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金融研究》, 2012 年第 3 期, 第 29—42 页。

- [51] 罗长远、张军,“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9a年第4期,第65—79页。
- [52] 罗长远、张军,“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管理世界》,2009b年第5期,第25—35页。
- [53] 吕光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研究:1993—2008”,《统计研究》,2011年第12期,第22—28页。
- [54] 马草原、王美花,“经济波动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财贸经济》,2015年第9期,第118—134页。
- [55] Mao, R., and Y. Yao, “Structural Change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An Application to South Korea”,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12, 17 (1), 29-56.
- [56] 宁光杰、维蕾、齐伟,“我国转型期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成因分析”,《经济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6—128页。
- [57] 钱震杰、朱晓冬,“中国的劳动份额是否真的很低:基于制造业的国际比较研究”,《世界经济》,2013年第10期,第27—53页。
- [58] Rodrik, D.,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7, 39 (3), 29-53.
- [59] 邵敏、黄玖立,“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期第4期,第1189—1210页。
- [60] 申广军、王荣、张延,“结构性减税与劳动收入份额——兼论增值税转型的分配效应”,《经济科学》,2018a年第3期,第61—74页。
- [61] 申广军、周广肃、贾坤,“市场力量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和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南开经济研究》,2018b年第4期,第120—136页。
- [62] 盛丹、陆毅,“国有企业改制降低了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吗?”,《金融研究》,2017年第1期,第69—82页。
- [63] 施新政、高文静、陆瑶、李蒙蒙,“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经济研究》,2019年第12期,第21—37页。
- [64] Solow, R. M., “A Skeptical Note on the Constancy of Relative Shar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48 (4), 618-631.
- [65] Stockhammer, E., “Why Have Wage Shares Fallen? A Pane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ILO Working Papers*, 470913.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013.
- [66] 唐东波,“全球化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劳资议价能力的分析”,《管理世界》,2011年第8期,第23—33页。
- [67] 唐东波、王洁华,“贸易扩张、危机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1年第9期,第14—26页。
- [68] [法]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 [69] 万江滔、魏下海,“最低工资规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微观证据”,《财经研究》,2020年第7期,第64—78页。
- [70] 王林辉、袁礼,“有偏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和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第115—131页。
- [71] 王宋涛、朱腾腾、燕波,“制度环境、市场分割与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基于中国工业企

- 业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第70—87页。
- [72] 魏下海、董志强、蓝嘉俊，“地区性别失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理论与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17年第4期，第129—146页。
- [73] 文雁兵、陆雪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机制分析——市场竞争和制度质量的双重视角”，《经济研究》，2018年第9期，第83—98页。
- [74] 翁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6期，第14—26页。
- [75] 翁杰、张锐，“户籍制度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机制和效应”，《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1期，第34—46页。
- [76] 肖红叶、郝枫，“中国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及其国际比较”，《财贸经济》，2009年第2期，第13—21页。
- [77] 谢攀、李静，“劳动报酬、经济周期与二元劳动力市场——基于周期性反应函数的估计”，《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第107—117页。
- [78] 许志伟、吴化斌、周晶，“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宏观福利分析”，《管理世界》，2013年第12期，第32—42页。
- [79] Young, A., “Labor’s Share Fluctuations, Biased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04, 7 (4), 916-931.
- [80] Zhang, H., “Non-neutral Technolog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Labor Deman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9, 140, 145-168.
- [81] 张杰、陈志远、周晓艳，“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抑制效应研究——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证据”，《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第44—60页。
- [82] 张莉、李捷瑜、徐现祥，“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1卷第2期，第409—428页。
- [83] 周茂、陆毅、李雨浓，“地区产业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合成工具变量的估计”，《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第132—147页。
- [84] 周明海，“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估算及其变动趋势”，《中国人口科学》，2014年第1期，第108—116页。
- [85] 周明海、肖文、姚先国，“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管理世界》，2010a年第10期，第24—33页。
- [86] 周明海、肖文、姚先国，“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度量与解释的研究进展”，《世界经济文汇》，2010b年第6期，第92—105页。
- [87] 周明海、肖文、姚先国，“中国经济非均衡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中国工业经济》，2010c年第6期，第35—45页。
- [88] 周明海、姚先国，“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的内在联系：模式比较与理论构建”，《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9期，第20—29页。
- [89] 周明海、姚先国、肖文，“功能性与规模性收入分配：研究进展和未来方向”，《世界经济文汇》，2012年第3期，第89—107页。

Revisiting the Causes of Changes in China's Labor Share Based on New Stylized Facts

LIU Yalin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EN Guangjun*

(Sun Yat-sen University)

YAO Yang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come distribution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licy issue, and the share of labor income is the core indicator of primary distribution, which affects the final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o a great extent.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research of domestic scholars on China's labor share in recent years. First, we describe five stylized facts of labor share changes. Particularly, we point out that China's labor share has stopped falling and turned to increase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n we summarize the reasons for the labor share changes mainly from five aspects: structural factors, economic fluctuation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ias, incomplete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markably, we sort out the literature explaining the U-shaped trajectory of labor income share before an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under a unified framework. Finally, we look forward to the potential directions of labor income share research.

Keywords labor share, income distribution, U-shaped pattern

JEL Classification D33, E25, J30

* Corresponding Author: Shen Guangjun,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No. 135 Xingangxi Rd., Haizhu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Tel: 86-20-84110672; E-mail: shengj6@mail.sysu.edu.cn.